



【法的精神之杨涛专栏】

(作者系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副处长、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客座教授)

缓刑的“罪与罚”

逐渐成为腐败的温床。

近来有关缓刑的负面新闻呈现增多的趋势。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报道,在云南永善县,被判以缓刑者,要向法院交纳缓刑考察费,收费标准从1000元到5000元不等。永善法院在2005年共对23件刑事案件作了缓刑判决,而2004年的缓刑案件数量则是2005年的两倍。《检察日报》也报道说,2003年至2005年,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宣告缓刑,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.5%,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.74%的年均缓刑率。

在许多评论者对永善县法院口诛笔伐之际,我却想到了缓刑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与问题。缓刑原本是一个良好的制度,是刑罚轻缓趋势的体现,体现了对罪犯教育的重视,避免了罪犯在监狱交叉感染。不过,从西方舶来的这一制度,在中国走样了,缓刑的判决主观性,让缓刑的判决特别随意;缓刑执行的虚无性,让缓刑成为了免刑的代名词,缓刑制度正

由裁量权。缓刑执行又如何虚无,我们也看看法律的规定:宣告缓刑的罪犯,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,离开所居住的市、县或者迁居,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。如果换在以往计划经济时期,每个人都约束在一个单位或者社区、村庄内,这种对于宣告缓刑的罪犯的管理与考察可能有效。如今人的流动性如此之大,“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”如何能肩负起考察这些罪犯的重责。正是缓刑执行虚无,缓刑在民众的观念中就等同于免刑,而缓刑期间违法犯罪的行为层出不穷。

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,要改变缓刑的现状,还得从改变缓刑判决主观性、执行的虚无性着手。改变缓刑判决主观性,首先就是要在法律上设定一些刚性条件,在诸如“悔罪表现”、“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”之间加一些可操作的条件,比如过失犯罪、或者赔偿了被害人损失得到

被害人原谅的等等,更重要的要在程序上制约,缓刑的宣告不能由法官说了算。是否可以宣告缓刑,我看还是由当地民众、罪犯所在社区单位的人士等组成一个类似陪审团的组织来确定。改变缓刑执行的虚无性,我也支几招:一是用司法行政机关的专门人员来取代“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”,比如说西方国家普遍设立的缓刑官。缓刑考察是重要的公权力,如何能委托其他组织来行使;二是让缓刑犯每周集中一次进行社区劳动和服务,让他们真正对社会感恩;三是可以对缓刑犯收点钱,德国刑法也规定缓刑犯要“向公益机构或国库缴纳一定金额”呢?不过,这钱绝不是给法官考察缓刑犯的辛苦费,而是缓刑犯遵守规定的保证金,这钱也不能由法院来收,否则法院就会根据钱交的多少来宣告是否缓刑,而是由检察院或司法行政机关收,一旦缓刑犯违反规定,便可上交国库。



【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】

(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副教授、知名时事评论员)

“领导不上头版”为什么受欢迎

个佐证。

重庆市去年年底出台了一文件规定:市委书记(市人大常委会主任)、市长、市政协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以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,《重庆日报》二版刊发消息,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000字;广播、电视报道不上头条,长度原则上不超过3分钟。《中国青年报》4月3日)

该文件发端于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动议,汪洋曾专门作出“领导同志的活动除有特殊要求外,一律放到二版以后”的批示。他说:“读者更关心地方领导如何履行职责,有哪些发展的具体思路,而不是到哪儿去了。”重庆市市长王鸿举、市政协主席刘志忠等人也认为,“不必领导的什么事情都往日报一版放”。

在剧烈的新闻变革中,在受众意识已经起了重要能动作用的今天,党报如果不主动改革、大胆创新,可能不仅党员干部不满意、普通群众不愿看,恐怕一些主要的领导干部也要不满意了。重庆市委书记的态度,就是一

随着准信息化时代的到来,特别是以网络、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大显身手,社会公众的信息来源和渠道逐渐多元,网络逐渐形成了对包括党报在内的传统媒体的强劲挑战。随着博客、播客、手机等意见表达渠道的日渐丰富,公众不仅可以便捷地接受多种信息,还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意见表达手段。在这种情况下,党报更应该有强烈的危机感:这种危机感不能仅局限于与新媒体的技术比较上,更要看到公众的接受心理。作为新闻纸,如果不是以新闻价值标准来选择新闻,而是以“排排坐、吃果果”的方式来编排新闻,恐怕受众就不是看报纸,只能是“翻”报纸了,甚至连翻都不愿翻了。太多的会议新闻、太多的领导人活动,只能让人敬而远之。

当然,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看,领导的活动往往多多少少都有值得报道的地方。但也有一些活动和报道,味同鸡肋,纯粹是应景文章。更有甚者,一些地方还存在

别加剧工薪阶层的厌税情绪

■今日视点

个税自行申报4月2日截止。从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,自行申报的总人数与估计的高收入人数有很大差距。而且从已申报人员的结构上看,仍然由工薪阶层唱主角,私企老板、自由职业者、个体工商户寥寥。(新华社4月3日)

对于绝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,工资一般都在银行卡上,多是少几乎一览无余,税务部门只要守株待兔即可。令人担心的是,如今的个税似乎正逐渐“赖”上工薪阶层。比如,个税1600元的起征点,其实就是针对工薪阶层设置的。目前,中国许多高收入群体的薪资非常不透明,灰色成分较大。但绝大部分工薪阶层的薪资却不是如此,他们应缴

的税金一般都是通过单位代扣代缴,偷漏税问题并不突出。国家对工薪阶层征个税,不但成本低,而且也比较容易。或许正因为如此,几十年来,个税竟然“赖”上了“工薪阶层”。可以说,为了保证税收来源,“工薪阶层”成了许多收入状况不明的“高收入者”的替死鬼。我想,国家应该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力度,而不是老盯着工薪阶层的口袋。个税既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,又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。对工薪阶层的个税征收不断加强,却放任这些灰色收入者游离于个税之外,能够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吗?能够体现税收的公正性吗?不但不能,反而会挫伤公民纳税积极性、加剧工薪阶层的厌税情绪。(林金芳)

政府埋单不如让“高压线”带电

■公民发言

广州在外营运社保基金10.18亿元,经过各方努力,目前已追回3.626亿元,还有1.05亿有望追回。剩下的5亿多元一旦无法追回,广州将用社会保险风险准备金进行填补。

(4月3日《信息时报》) 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,亏空后政府埋单固然有一定必要性,但让社保基金这条高压线真正带电才是当务之急。去年11月22日,温家宝总理指出,社保基金是“高压线”,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,违法违规问题要一查到底,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用总理的讲话来打量广州的政府埋单之举,是否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语

焉不详,这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。要让社保基金“高压线”带电,首要的是严肃处理侵占挪用者。其次,目前社保基金存在的乱象不仅仅是侵占挪用,还包括政策执行不严、管理不够规范等等。较之侵占挪用,政策执行不严、管理不规范往往为人所忽视,因此,社保基金这条“高压线”更应该有确保政策执行、督促管理规范的功能。
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去年底就表示,《社保基金管理条例》已纳入立法日程,据悉该条例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草。对此,有论者担心:如此有利害关系的部门,能够在立法时大公无私,对违规行为作出严厉的惩处条款吗?应该说,这种忧虑并非多余。(华四和)



【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】

(作者系著名杂文家,《长江日报》评论员)

病人是会走路的钱币?

半是因为身体暂时还算争气,半是因为讳疾忌医,我跟医院的联系实在脆弱。单位里两年要组织一次体检,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,每次都找客观原因,早上起不来啊,工作忙啊,等等,其实是怕找出什么病来。

基本上,我觉得体检是一种没病找病的事情。我想如果身体有病,总会反应出来,既然没有反应,就不必去找病了。何况,就算真的有病,束手无策的还是束手无策,治得好的还是治得好,早找出来,不过早过上病人的生活罢了。近几年,我跟医院的交道,只限于肾结石疼痛时去打几次止痛针,平均每年不到一次。有过一次意外就医的情况,那次是去访一个住在医院的朋友,下车时碰破了皮,为了表明对我的健康负责,朋友强拉我去进行了医疗处理,为成就朋友的负责精神,我勉强同意配合治疗,清创、消炎、防破伤风,本来医生还要求缝针,我觉得那未免小题大做,坚拒,忙了大半天,花费近两百元,照我看,纯属多余。

我相信,看过上面这些话,你已经知道我是一个对身体健康缺乏科学态度的人。对此,我毫不打算否认,在身体健康上,我确实欠缺科学精神。也许这算是一个毛病吧,但我处置的只是自己的身体,并未影响到他人。

我当然也听过不少医疗故事,主要反映是太贵。贵,固然是大问题,但只要真的有病,而贵了又能治好,也不妨是医疗的功德。也看过各种“天价医疗费”的报道,大致是花了天价,却很难谈得上治疗的效果。

有一位同事去装心血管支架,说价格大概是5万多元,手术台上,医生突然夹住动脉,说情况有些复杂,需要7万多块钱才能做得了,于是临时回家筹钱2万,才将手术做完。很多情况下,所谓治疗方案,我听了觉得是基于“清空口袋”的原则而制定。同样一个病,有5万元的治疗方案,也有20万元乃至几百万

元的治疗方案,采取哪一种治疗方案,视你在清空口袋的情况下能掏出多少钱来,而这些治疗方案在效果上的差别已经小到可忽略不计的程度。一个病越是在医学上无能为力,那么通过治疗而“家破人亡”的可能性就越大。

我想,这些总还算是治病。但医院创收并不总是以有病为前提的。最近,媒体上广为刊载的新闻说浙江电视台记者在杭州10家医院进行尿检,送检品为茶水,6家医院检出了红细胞和白细胞,诊断为“发炎”,其中5家医院开出总计1300元的消炎药。茶能够检出发炎来,尿当然就能随意检验为发炎和感染了。前两年,央视记者在武汉暗访一家医院泌尿科,好生生的,就成了性病患者,医生要求打针吃药,否则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

这些事例表明,凡进入医院的人,有病没病都是可以找出病来治的。有病给你治病,没病也给你治病,反正把钱弄到医院手中就行了,而且吃点消炎药什么的,也不会立见恶果。早些时,街上常见一些人,穿上白大褂充医生,说是“免费诊断”,然后卖药,唬弄不少人,医院就提醒人们那些都是骗子,有病没病还是得上正规医院去诊断,现在看看,正规医院就必然不会行骗术了吗?

某年春节晚会(当然是早年的春节晚会),有一传统相声节目,名为“拔牙”,一名江湖游医说专擅拔牙,见人捂牙而至,问“你怎么不好”,“我牙疼”,游医得意地问,“牙疼找我来啦?”然后开拔,然后鬼兜收场。现在的一些医院,大约便是这种状态,“有病找我来啦?”然后有病没病都得吃药打针。“没病!没病你上医院干什么呢”,大概一个人上医院,总该多少有病,你没病要往医院跑,本身就是有病的征候。在医院眼里,你很可能是会走路的钱币。

因此,如果有人像我一样,“敬医院而远之”,我觉得是正常的。当然,你还要证明自己不属于走火入魔才好,否则又是“不上医院”也是罪过。

发生矛盾先从干部身上找原因

■热点纵论

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说,一些干部有个不好的习惯,凡是发生了矛盾,首先在群众身上找原因。只有不讲道理的领导干部,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。一些干部早就脱离了群众,还口声声说群众难管。你不把心思花在工作上,花在老百姓身上,群众怎能能够服气?

(4月3日《人民日报》) 在许多干部习惯了“唯上”,惟独不习惯“唯实”和“唯下”的情况下,卫留成的话有如醍醐灌顶,发人深省。

是的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一些干部凡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,工资待遇要高要好,但工作却要求轻松自由,贪图享受——办公室唯恐不豪华,小车唯恐不高级,他们满脑袋精英意识,高高在上,自以为是的,以为官职大就水平高,对群众简单粗暴,盛气凌人,一副官员作派;见了更高的领导却低眉顺眼,低声下气,溜须拍马,讨好逢迎。如果说过去的领导作风是密切联系群众,现在在一些地方则变成了“密切联系领导”。道理很简

单,因为在他们看来,群众影响不了自己的命运,因此完全可以忽视乃至蔑视;而上级领导则决定着你的前途,非讨好不足以言“进步”。如果说当年的干群关系是平等和亲密的,现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,则被紧张和疏离所取代。干部与群众等级森严,壁垒分明,车补、豪华公车、豪华办公室,似乎衣食住行一切都透着区别。更有甚者,一些单位奉行什么“领导绝对正确,群众必须绝对服从”,群众稍有微词,轻者被调换岗位,重者则被打去迫害,甚至被清除出去。在这样的地方,群众怎能没有怨气?社会怎能和谐?“有事先从干部身上查起,才是科学的群众工作方法”,卫留成无疑是“唯实”和“唯下”的,只有心里有群众,才能说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——什么是能力?什么是政绩?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和问题就是能力,就是政绩。(海瑶)

本版文章
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